

●《文汇月刊》报告文学选

# 人生 环形道

●四川文艺出版社

RENSHENG HUABIAO JANXINGDAO

《文汇月刊》报告文学选

# 人生环形道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廉正祥

封面设计：范一辛

版面设计：李军

**书名** 人生环行道

**编者** 《文汇月刊》编辑部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攀枝花市新华印刷厂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665 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 233 千

ISBN7-5411-0109-5/I·108

统一书号：10374·422

定价：2.02 元

## 目 录

送你一棵勿忘草.....	周玉明	1
——朱明瑛赴美前的心里话		
思乡曲.....	叶永烈	28
——马思聪传		
金凤凰.....	肖复兴	91
人生环行道.....	蒋巍	113
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	孟晓云	153
“死亡之海”——希望之光.....	白桦	174
变法记.....	李祯林 李廷国	194
——一个连长和他的四个兵的故事		
天下第一兵.....	马继红 马春林	215
魔鬼教练.....	戚鸣 刘进元	232
姚迁之死.....	庞瑞琨	248
论观念之变革.....	陈祖芬	272
当金山的母亲.....	肖复华	308

# 送你一棵勿忘草

——朱明瑛赴美前的心里话

周玉明

(就象通了感应电流似的，我正惦念着朱明瑛，不知她哪天赴美留学？就在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正是她！话筒里传来了她那急匆匆的、冲击波似的声音。)

## 拿到了赴美国留学的签证

我在美国大使馆拿到了赴美国蒙特利尔国际学院留学的签证了。再过十几天，我真的要走了。我去的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学府，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个城市只有五千人，住的很多是名人，那里还住着几位美国著名的音乐家，我可以受到丰富的文化艺术熏陶。我是公派自费去的，不会不回来，也压根儿没想过不回来。好在这个学院3个月一次假期，我在美国学习期间，还可以经常回祖国干些自己想干而以前干不成的事。啊呀呀！我脑子里想干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一见到我，就把我领到总领事办公室。我们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总领事

瞪着那双蓝眼睛，惊叹道：“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学英语？”我说，“我想把美国的民歌学习好，我的英语一定要不是一般的好，而是要地地道道的好。”这个“大鼻子”总领事只用几分钟就办好了我的签证。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祝贺你，你被批准了，祝你旅途愉快。你是把中国音乐和美国音乐进行交流的第一个文化使者。美国人盼望能在美利坚听到你的独唱音乐会。”他说得越热情，我心里越是酸楚。遗憾的是，我在国内唱了5年多，到今天也没能开成我日思夜想的独唱音乐会。我准备了那么多我精心挑选的、反映我内心思绪、情感的歌，可我等啊，等啊，一直没机会唱出来。唷！不能再跟你在电话里长谈了，我马上要去参加为非洲难民捐款的义演，非洲闹灾荒了。这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次演出。我这人怎么有这么多戏剧性啊，我是从唱非洲歌开始的，又从唱非洲歌结束，我得去了。

嘿，我签证完了，从来不喝酒的我，晚上回家一个人喝了许多许多酒……

（朱明瑛急切的声音，突然间被什么涌上来的什么东西哽住了。不知怎么的，我只觉得手中的电话筒里也冲出一股浓烈的酒气，我也有些醉熏熏的了……）

迷蒙中，我回忆起前不久，她跟我两个人进行的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那不仅仅是一个女艺术家跟一个女记者在对话，而是一个成了名又遭到非议的女人，在跟一个她所熟悉的同龄人、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姐妹，在披露胸襟，倾吐衷肠……

那天，是4月20日吧。我专程赶到北京的当晚，就去看望朱明瑛。她那双总是在燃烧着眼睛，深陷在乌青的眼圈当

中，本来瘦削的下巴更尖了，下巴右侧的一颗美人痣显得更黑更大了。她穿着紫红色的毛衣开衫、黑色的紧身裤。纤巧的身子，一举一动都象是在舞蹈。她是属于“激动型”、“多血质”的，一说话就情绪亢奋，呼啦啦地从心底冒出那么多深思熟虑的话。那天我俩谈了一个通宵，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话题是由我起头的，我问她：“社会上街头巷尾，纷纷扬扬，说你要到日本去留学，又传闻说你要嫁给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

“一派胡言！”激动型的朱明瑛一下就站了起来。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说：“与其让人家胡编乱说，还不如你自己站出来说说清楚，澄清事实，你说吧！”

见我这么“仗义”，她用感激、信任的目光注视了我许久、许久，然后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似乎要自己心底埋藏着的一团团纷乱的思绪理清。她的神情那样庄重，那样认真，她用她那特有的沙哑、鼻音很重、共鸣很强的声音娓娓道来，这是她临行前的内心的弦音……）

真的，虽说我才37岁，还没到老态龙钟的年纪，但我一直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冲动，想对自己作个小结、划个句号，把自己在艺术道路上所洒下的心血、汗水和泪水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我的一切都属于我热爱的事业——我的时间、我的痛苦和幸福，我的欢笑和抽泣……我正视自己的真实感情，正视真实的自己。我愿把自己的心不失真地袒露在所有关注我的人们面前，我不怕。

但现在我还不能写这本书，还没到时候。等我再多干些自己想干的事，再多长几岁。

## “笑话！鬼话！屁话！”

我最讨厌推理，我们国家有些人最会用假设推理了。我现在听那些歪曲、诋毁、嫉妒我的人胡编的我的种种故事，就象听说别人的故事那样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比如，有人在小报上说，我要去日本留学。有些人知道我离婚了，就马上推测说：“朱明瑛要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了，找到块‘跳板’要走了。”这还不算，继而还在这个虚构的谎言基础上，“评论”说：“她不爱国，这么大的中国也留不住她！”笑话！鬼话！屁话！天上、地下，我没有一个日本男朋友等着我去结婚。再说非得嫁给外国人才能出国吗？何况我现在去的不是日本，而是美国。

我是搞亚非拉音乐舞蹈的，过去我依靠自己多年来的积累，自编自导自演“亚非拉”。现在肚里已挖空了，关在家里我再也编造不出亚非拉歌舞了。我从艺25年，只出国演出过一次。人家称我为“中国的阿贝蒂”，可我从来没有去过非洲，我唱的歌全是从录音磁带中学的。每天从早到晚，我摁着录音机，把磁带都听坏了，机器被我使烂了两个，键都摁飞了，送到店里也没法修。难道我永远只能在歌唱上当个“复印机”吗？说我朱明瑛是“中国的阿贝蒂”，我没什么高兴，我还是仅仅象阿贝蒂，不是我朱明瑛，这有什么出息！真正的阿贝蒂前不久从非洲捎信来，她叫我朱明瑛姐姐，说感谢我使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她说她要是到中国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我。可我连她的录像都没见过，只听说阿贝蒂比我小3岁，却有我3个朱明瑛那么胖。——我是“轻量级”的，她是“重量级”的。

我感到自己被榨干了，压力越来越大。人民给我的荣誉远

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本领，我不能光靠闭门造车“唬”我的父老兄弟。我要开阔视野，汲取营养，创造，创造，再创造！我特别爱幻想，我素来相信幻想加努力等于现实，凡是我想干的，我一定要办到。没有幻想就没有成功，就没有未来，就没有一切。

现在的流行唱法、通俗唱法，整个儿在走下坡路。把我们这些唱歌的人的声誉搞坏了。社会上有些所谓音乐会太糟糕了。说是提倡创作自由，实际上是在搞混乱自流，没有开拓出一条属于我们自个儿的路。中国这么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声乐上理应走在前头。我提倡搞民间的音乐，但不是主张一味的“挖祖坟”，也反对不加选择的模仿外国的和港台的。我对任何艺术、任何艺术形式，对洋唱法、土唱法、通俗唱法都一视同仁。要满足不同层次的观众的要求嘛。我们的精力不能再耗费在互相排斥、互相谩骂上了。自己人整自己人，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相互涂黑对方，对谁有利？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携手并进，花大力气研究、探讨，行动起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

说来可怜，我们这些通俗唱法的演员，是在漫骂声中唱红的。谁被骂得最凶，最后谁就最红。流行歌曲刚兴起时，比较集中的是骂我和苏小明，以后冒出个成方圆，就指责成方圆；小程琳出来了，又大报、小报批判她。歌坛上几乎是出一个新人打一个，敌情观念真强。我们这些人是被批判出名的，好不容易才被社会承认了。但是随着你名声飞扬，谣言也在扩散。这已经不是叫人烦恼、苦恼的问题，而是叫人觉得太可怕了。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唱这个歌，不出这个名了。

不少小报真叫低级庸俗，老是热衷于登载我们的所谓“轶

闻”和“秘史”。我的亲属来信说，在东北大街上，报贩们扯着嗓子叫喊着：“喂！喂！请看《朱明瑛离婚之谜》。我的亲属不忍心听下去，一气之下，把报纸全部买了下来。善良的亲人啊，真傻！你能买下全部报纸，可你堵得住那一张张刀子似的嘴吗？

（朱明瑛气得直喘粗气，她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我劝她说：“别生气，有人注意你，就有人要破坏你，一个能被人嫉妒的人，恰恰是最有力量的人！”朱明瑛凄然一笑，露出一排白玉米般的牙齿。她沉思了一下，又说：）

在我没有出名之前，我受了很多委屈。出了名以后，又尝到另外一种委屈。各种各样打着各种主意的人也闯进生活中来了，包括那些不地道的男人，利用职权打你的主意、揩你的油的男人。对一个知名的女人，一心想干事情的女人，这个“难”无法说，我要学会对付，我对付得真累啊！我有时真想报复，可我懂得最能医治创伤的，不是去报复，而是去奋斗。你报复得过来吗？找谁去报复？我要学外语，学唱歌，学和艺术有关的一切东西，我整天踏着时钟的秒针赶路，哪有精力去寻欢作乐。我做事不是为给人看的，我干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我之所以能成功，全在于我把精力集中在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无论把我捧得多高，我还是90多斤；无论把我骂得怎么一钱不值，我也还是90多斤。

（说完，她挺直了身子，使劲挥动着双手，似乎轻松了许多。我突然发现了朱明瑛身上那种出乎我意料的动人之处。人

哪，要做个正直的人是太难太难了。)

## 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忧心、痛心

我倒不是气坏了，而是急坏了，不是光为自己老是被人评头论足，而是为音乐界的现状伤心、忧心、痛心。流行唱法只能热闹一时，很难持久。这是因为我们一味模仿港台味，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确实太闭塞了，再不改革更新，就彻底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我听自己的录音磁带，就受不了，这难道就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水平？我看自己的录像，一边看一边浑身冒汗，真怕观众腻味，不屑一看。一听到观众拼命鼓掌，我内疚极了。

我一开始唱歌，就专攻各国民间的东西，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搞流行歌曲总有时代局限性的，只有搞民族的民间的东西，生命力才最强。现在这些现代歌曲，因为你模仿我，我模仿你，大同小异，路越走越窄。在邓丽君受批判时，我曾自己偷偷练了一组邓丽君的歌，大伙儿听后，说我唱得活脱活象。我是想在模仿中探寻她的精髓所在，把她的味道吸收到我自己的演唱中来，溶化为我自己的，但我绝不愿意象她，我还是要象我自己，并要让每盘磁带都不一样，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们东方歌舞团又培训了个13岁的女孩徐明，大伙儿叫她“小朱明瑛”。她学唱歌的老师就是磁带上的朱明瑛。她学我学得象极了，连我的缺点——音不准也学得很象，象我的录音机一样。可我却暗暗为她担心，她不能只满足象我，她必须象她自己，必须一代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拜我为师时，我教她的首先是让她要象自己。

随着文艺政策的开放，现代唱法活跃起来了，我去外地各

省市，看到舞台上的歌唱演员都“舞”起来了，有的在台上胡扭乱扭的，看了真恶心。最叫我恶心的是，他们还打着向朱明瑛学习的招牌，说是跟我学来的。可是我在台上的一扭一动、一招一式都要求自己很讲究、很地道的。我坚持舞蹈的基本功训练整整20多年了。不能去国外学，就从电影里学。有一次我看印度歌舞片《哑女》，从早上看到晚上，不知看了多少场，连座位都没挪过。我妈说我小时候看歌舞片，每次散场时，都要抱着电影院的大柱子，哭着不肯走，吵着要看第二遍。可我妈没有钱来满足我这小小的欲望。在埃及，为了掌握东方舞蹈中的抖胯动作，我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向守门的小孩子请教，看了小孩的示范动作以后，等不及回到住处，立即就练起来。我在舞台上花的力气是很大的，我的舞蹈连外国人都承认是正宗、地道的。以前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跳的扭摆舞是专给小流氓看的，我不服气。去它的！现在台上的胡扭乱扭，全被说成向我学的，我才不承认！

现在的音乐会演出，请外国歌星、港台歌星成风。来一个演员，光设备、灯光、音响就有几十吨重。他们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推动了我们，但同时也冲击了我们，谁愿意落后？我们的更新不能换汤不换药，不能做“复印机”。我出国就是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要看个明白，要榨出国外声乐方面的精髓，结合中国的国情、欣赏趣味、审美情趣和民族习惯，摸索出一条我们自己的声乐路子。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这需要全体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反正，我不会让自己悠悠闲闲的，我的生命乐趣就在于榨取自己。我几乎每天都是半夜1点睡觉，早晨5点起床。前不久，我用了7个月的时间编了一本《我演唱的歌》，共20多万字，编译了26个“亚非拉”国家的80多首

歌曲，每一首歌后都有我自己写的一篇小文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马上就要出版了。这是我们演员里自己编著出书的第一本。这也算是给专业和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一点资料吧。如我不及时将这些发表出去，那就会烂在我的肚里了。我以后到美国学习后，还要出一本有关介绍美国的民歌的书，以后还有第三本、第四本……我太贪得无厌了吧！

过去观众对我的印象，就是涂成黑人唱非洲歌的印象，连我们团里的人也以为我不能唱中国歌。后来我穿着大红袄唱了个《回娘家》，一下子电台、电视台、各文艺团体都唱上《回娘家》了。清除精神污染时，我说这是一首河北民歌，实际上这是邓丽君最早唱的中国民歌。要是我当时这样老老实实说，就回不了娘家了。各省、市以及电台、电视台、报社，五花八门的单位都来邀请我去演出。我认为一个演员不能演烂了，天天出来唱《回娘家》，观众最后准会把我赶回娘家。我必须加强各方面的艺术素养，积累、更新自己的节目。不能为了捞油水，把自己唱“油”了。奇怪不，我越是不肯露面，观众越是想我。这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吧，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越想得到它，看到它，听到它。每天我家里门庭若市，来请我去演出的人，从早到晚不断，简直是没完没了。幸亏我从去年10月起搬进了这3间一套的公房。这下可好，3间屋子全成了接待站。我一个一个屋子的轮着“接见”。以前我一间屋子半间炕，客人只能在门口排队象医院等门诊挂号似的。我爸爸说我：“你比外交部长还忙！”我苦口婆心地对请我去演出的人讲不去演出的理由和原因，讲得口干舌燥、嗓子都嘶哑了，真比我唱歌还累啊。可是，我为这个还是得罪了许多单位，很多人误以为我嫌钱给得少，拿架子。

《门铃声，电话铃声，闹钟铃声几乎同时响起来了。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还有人来访。朱明瑛的老父亲去开了门。喔！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来找朱明瑛商量录像的事。电话呢，是从美国打来的长途，蒙特利尔国际学院催朱明瑛快办签证手续，学院6月17日要开学了。朱明瑛接完电话，随手拿起一张美国华人报纸《中报》扔给我看，旋即她又急步跑到隔壁屋子里去接待那个导演了。我翻着报纸，一眼看到一则消息：《朱明瑛以演唱中国民间小调〈回娘家〉荣居“十大金曲”榜首》。一抬头，又见墙角落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这似乎与高雅的房间布置很不协调，只见上面画了几十个蓝色的圆圈。原来朱明瑛每唱会一个国家的歌曲，就在这张地图上的那个国家划上一个蓝圈儿。我想起来了，以前听她说过，她发誓要在这辈子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歌都学会。

送走客人，朱明瑛这个“急旋风”又象旋风一样“旋”过来了。我问朱明瑛：“你唱那么多国家的歌，嗓子的音域一高能高到2个半8度，一低又低到女中音，这么宽的音域，在唱通俗歌曲的人中是罕见的，而且你的嗓子经久耐唱，是天生的吗？”朱明瑛使劲摇着头，神秘地一笑，她扬起脖子唱起外国歌剧咏叹调，活象胡晓平的声音。她告诉我，她是向学院派学的科学发声方法，老师是洋唱法的声乐教授岑冰。她学得很用功，因此能保持住嗓子的能力、功力、潜力。嗓子要它亮就亮，要它沙哑就沙哑，可以随心所欲。要说嗓子的本钱，她幽默地下结论说，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大辩论时练出来的。)

对了。我给你说说我的造反史。我真恨那个“文化大革命”，把我18岁到28岁最美好的年华给糟蹋了。我是东方歌舞团

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从小背着个“家庭复杂”的黑锅，一心想紧跟毛主席闹革命。当时我背毛主席语录，除了军事方面的，全都背得滚瓜烂熟。我对“新潮流”接受得很快。我们的造反队到处去点火、串联、刷大标语。有时通宵大辩论，我带着红袖章，穿着军大衣，在文化部的台阶上一站，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我辩论时哒哒哒、哒哒哒的还真能说。对方说1句，我有10句等着，不让别人有空隙插话。我是天生的哑嗓子，因为不停地念语录、喊口号、大辩论，这样锻炼后无形中学会运用丹田气，底气也足了。哑嗓反而喊亮了。我在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唱全剧的沙奶奶，声音脆亮脆亮的。后来造反队让我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真是又长口才，又长组织能力。我虽不是造反派的主力，但我的笔头快，成了造反队的笔杆子之一，写过长长十几张的大字报，批判王昆。当时东方舞禁跳了，只能跳“忠字舞”，我一场不拉，跳得比谁都认真。

清除“5·16反革命分子”时，我由于造反坚定，被工宣队、军宣队重用。我觉得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总是对的。可当团里一下子揪出那么多“5·16反革命分子”时，我产生了疑问。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信，当时连林彪、江青这两个坏蛋的名字也写上了。“毛主席老人家：我们东方歌舞团是周总理亲自建立起来的，现在不知怎么出现了那么多‘5·16分子’，我有怀疑……”也许周总理收到许多东方歌舞团的来信，不久，正在生病的周总理马上召见东方歌舞团的头头。周总理一再强调东方歌舞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5·16反革命”。由于我帮“5·16分子”讲话，工宣队、军宣队拍着桌子整我：“你比‘5·16’还‘5·16’，我们白白地信任你了！”从此我失宠了，被打入“另册”了。

## 我和王昆

我的纯洁性和积极性常常被人利用。造反派们都想批王昆，谁抢到手，谁就显得造反坚决。王昆是被打得最惨的了。造反派把她一脚踢到门外，一个巴掌打过去，五个血手印，还胁迫王昆的儿子，让他隔着屏风揭发妈妈的罪状。以前我只是在小说《红岩》里看到过国民党打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也打共产党，我心里发颤，感到这太残忍了。每次王昆被打后，让我看守她，陪她睡觉，怕她自杀。我看守着她，却不能跟她说话，要划清界限呀。我当时只能相信毛主席，不能相信她王昆。我老是用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来“坚定立场”、“激励斗志”。在这 10 平方米的小“牢房”里，我闷得慌，就下意识地哼唱着曲子。有一次王昆悄悄对我说：

“朱明瑛你唱歌有味儿。”

“我没嗓子。”

“嗓子是可以练出来的，只要乐感、耳感好就行。”

“我能练得出来吗？”

“哪一天等我解放了，我一定教你。”

可“文化大革命”伤了我们大家的感情，派性给我们带来了长久的隔阂，我整过王昆，良心上甚至允许王昆对我进行报复，这样似乎才能解脱我心头沉重的负疚之感。我不知道该对谁恨，我知道自己也是被利用的，但我又向谁去算帐呢？我象做了一场恶梦。十几年里，我没当过主角，在舞蹈队里“以补为主，兼学别样”，节目的正式名额没我的份。谁突然病了，有事了，就让我补上。还被人嘲笑：“看，她跳成这样！”我的自尊

心被伤害了，我只觉得孤独地活在孤岛上。在这种无处发泄的情绪下，艺术是我特效的“镇定剂”，我开始发愤钻研业务，学英文、学唱歌了。以后的事实说明，只要你努力了，把知识积蓄在你的身体里了，那就没有白费。我并不怜惜自己，因为我一直在想着比自己更重要的事业。我才不是什么“暴发户”，我的成功全在于我的苦斗、苦干。我朱明瑛，并非如我的名字所表示的，用明亮的美玉所铺垫，而恰恰相反，是用苦难的碎石筑成。可我也很有福份，1979年领导上第一次审查我唱歌时，因争论不下，请示当时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赵起扬，他现在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了。他很开明，说了一句：“见观众，让观众决定！”这一场关键性的演出，我一上台就“爆棚”了，同行们都冲我竖大拇指。台下的观众疯狂了，有扔帽子的，有呼“万岁”的。我一见观众就被承认了。从那次上台后就一直没有下台，整整唱了5年多。那次举办《新星音乐会》时曾冒出一批歌手，记得荣高棠当时对我们说：看你们当中，明年、后年、大后年，谁不倒？我一直记住这句话，为了我爱的观众，我不能倒下去。我要在台上唱下去，我付出了玩命的代价，我不后悔。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吃了不少不懂人事学、关系学的苦头。我要办什么事，就得送礼，我48元的工资送得起吗？我要别人为我办事，就要帮别人办事，我哪来那么多精力？有些人只花1分精力在业务上，却把9分精力用在人事上。我最看不起这种人。这种人没有本事，只能靠奉承拍马，我要靠真本事，情愿吃亏，也要凭本事吃饭。

人最聪明的生存方式，就是时时刻刻都不要悲观、消极。你一悲观、一消极，积极的东西、乐观的东西也可能给你吓跑